

近代中国与世界

(第二卷)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善邻译书馆 [日] 狭间直树 /1
- 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桑 兵 /14
- 近代日中社会主义交流之经验
- 以大杉荣为例 [日] 嵯峨隆 /40
- 近代日本佛教在华传教的主要基地
- 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 忻 平 /54
- 抗战前后日本在华从事有关佛教的活动 侯坤宏 /76
- 日本对中国的观察与陈立夫访苏计划的泄密
- 从日本未刊档案解析历史之谜 [日] 鹿锡俊 /95
-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 居之芬 /112
- 战时日本对冀东的“三光作战”(1937~1945) 李恩涵 /134
- 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女士日记中的日军性暴行 张连红 /156
- 胡乔木晚年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 李良志 /169
- 中英开平煤矿权利纠纷的再认识:以严复为中心 马 勇 /186
- 英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
- (1949~1951) 王建朗 /210
- 抗战爆发后德国军火输华述论 马振犊 /233
- 十九~二十世纪波兰与中国的关系 [波] 施乐文 /249
- 出国留学对中国近代世界观形成的影响
- 清末中国留法学生 [法] 巴斯蒂 /259

| | |
|---|--------------|
| 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留法学生的经历与见闻····· | 张玉法 /281 |
| 十九世纪香港华人社区的商界大佬····· | 〔美〕陈锦江 /314 |
| 1900~1941年香港航运发展概述····· | 张俊义 /324 |
| 二十世纪早期香港华人的职业构成及生活状况····· | 张丽 /337 |
| “葡萄牙人助明驱海盗而得澳门”说再辨析····· | 陆晓敏 /356 |
| 从华文报纸看清末的澳大利亚华侨····· | 邱捷 /367 |
| 救灾与救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澳洲华人之 中国情怀····· | 赵令扬 杨永安 /381 |
| 半封闭格局的终结与全球化浪潮中的抉择····· | 董志凯 /402 |
| 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1912~1949）····· | 虞和平 /419 |
| 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 | 朱荫贵 /452 |
| 新银团的再审视····· | 宓汝成 /473 |
| 跨国境领域的经济秩序 ——上海经济网和黄海交易圈····· | 〔日〕古田和子 /492 |
| 环中国海的华商商业网络：泰益号个案研究 （1901~1939）····· | 戴一峰 /509 |
| 机纺毛纺业以及“打毛线” ——东亚公司1930年代进口替代行销策略对 中国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影响····· | 〔美〕史瀚波 /531 |
| 武进织布业的近代化过程····· | 〔日〕森时彦 /544 |
| 中山地区商人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商业活动····· | 蔡志刚 /569 |
| 中国商会走向国际舞台的新步幅 ——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及影响····· | 朱英 /584 |
| 近代天津商会与外国商会互动联系的建构····· | 宋美云 /605 |
|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与香港经济关系的变化 ——亚洲与世界关系调动中之一发展····· | 林满红 /622 |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 善邻译书馆

〔日〕狭间直树

众所周知，世界史的近代，是西方近代文明席卷全球的时代。因此，面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到来，在各个地区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出现与其对抗的行动，而实际上所出现的，正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多种对应的情形。在明治十年代的日本，其一种对应情况是打着“兴亚”的旗帜，力图对抗西方的亚细亚主义的出现。这在19世纪后期的东亚，曾是一种立足于传统的近代化的新尝试。亚细亚主义这个提法，因后来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被看做日本霸权主义的同义词而臭名昭著。然而在提出的当初，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因此不妨重新审视一下那段历史。

谈起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团体，很多人都会想到东亚同文会，但却几乎没人知道这里所提到的善邻译书馆。这个组织很小，1898年秋在东亚同文会前后创立，仅活动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然而，其事迹却极有特色。虽长期埋没，所见资料有限，但姑举其概略如下。

一

最早向中国介绍善邻译书馆的报纸是上海的《申报》。1900年1月初，《申报》登载了两条消息，分别以《善邻有道》和《记日

本创设善邻译书馆摇系之以论》为题，对善邻译书馆做了相当详细的报道^①。前者报道说：“日本文学博士重野诚斋，鸠集同志诸君，创设善邻译书馆，取和文西文书籍之切于世用者，译作华文，礼延四明王黍园明经，为之润色，刻已刊成四种。”重野诚斋，即日本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重野安绎（1827～1910）。这条消息介绍了以重野为召集人的善邻译书馆成立的目的是要汉译重要书籍，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且已刊行了四种书。当时登载这一消息，是由于“馆中干事松本、吾妻二君”携带成书来沪^②之故。该报道对通过书籍流通，而“从此情谊相通，邦交益固，文章有神交有道，我将于馆中诸君卜之”及其意义，做了高度的评价。

在后一条消息当中，作为“馆中诸君”，列举了重野、三岛、岸田、龟谷、蒲生、吾妻、松本的名字。三岛即名气很大的阳明学者三岛中洲毅（1830～1919），岸田即伴随着乐善堂的眼药而知名的中国通岸田吟香（1833～1905），龟谷即省轩龟谷行（1838～1913），蒲生即蒲生重章（1833～1901），松本即三岛的弟子松本正纯（1866～？），吾妻将在后面提到。他们“相与醖贲”创立善邻译书馆，是基于“日本自战胜中国之后，目击俄罗斯夜郎自大，渐肆其鲸吞蚕食之心……俄之利即日之不利，欲使日本跻于强盛，非联合中国不为功，于是一变其远交近攻之谋，日思亲昵”之形势判断，在朝野上下各自的努力奋斗当中，期待着自己能有所作为，“独至文人学士，即无尺寸之柄立朝而抒宏谟，又不能仕中国为客卿以成楚材晋用之效，踌躇再四，计惟是广译书籍，俾东西各国之良法美意，渐渐为华人所深悉，亦足以使之日有起功”。从这条报道当中，可窥知当时的日本知识人想要翻译提供“东西各国之良法美意”的意图受到中国人士坦率欢迎的时代氛围。

① 《善邻有道》，1900年1月8日《申报》。《记日本创设善邻译书馆摇系之以论》，1900年1月10日《申报》。

② 参看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 亚洲主义实业家的生涯》，1月5、7、8日条，研文出版，1999，第348页。

二

吾妻兵治（1853～1917），号醒轩，秋田县人，善邻译书馆干事。其伯父是著名汉学家根本通明。就学于藩学明德馆。20岁进“秋田县共和塾”修英语，成为英语教员，1875年到东京，加入中村正直主办的同人社并参与编辑机关杂志《文学杂志》。虽因语言特长而受托于文部省，但自1882年以后，供事于外务省，主要从事翻译方面的工作。后虽有一段时间“非职”（日本法制用语，“挂职赋闲”之意），却于1890年8月出任“陆军教授”。1896年6月“依愿退职”；两年多以后，1898年10月与志同道合者在神田猿乐町创立了善邻译书馆。据说，在该馆创立之际，吾妻等人曾到板垣退助和小村寿太郎那里去活动，得到了外务大臣两千日元“机密资”的补助。^①

在这一期间，吾妻兵治官职以外的工作应该特别注意，即在亚细亚主义团体亚细亚协会的活动，然而《行略》没涉及。亚细亚协会是由曾根俊虎等人于1880年3月创立的，1883年初改组，名称改称兴亚会，是亚细亚团体当中历史最长力量最大的团体。其宗旨是，在欧洲的进攻面前，为挽回亚洲的颓势，主张日清两国应该合作。这个团体在当时很活跃，但在1900年3月被东亚同文会所吸收。^②

吾妻兵治1883年加入亚细亚协会，马上就承担了会志《亚细亚协会报告》（第7～14号）的编辑工作^③。翌年因病辞职。1885

① 宫内默藏：《吾妻醒轩君行略》，《英汉和对译泰西格言集》卷首，敬文馆，1922。

②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对外硬运动之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第110、120页。黑木彬文：《兴亚会·亚细亚协会的活动与思想》，黑木彬文、罇泽彰夫编《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全二卷，不二出版，1993。以下所引之《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均出于此。

③ 《亚细亚协会报告》第7～18号（1883年8月至1885年9月）。

年复职而与草间时福、山吉盛义协力编辑第 18 号。其间的 3 号（第 15 ~ 17 号），由冈本监辅代替吾妻担任编辑。关于冈本与吾妻的关系后面将要谈到。

善邻译书馆刊行的四种书籍是《大日本维新史》、《国家学》、《战法学》和《日本警察新法》^①。所见三本书之版权页，皆为“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印刷”，“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行”。并有“著作者”、“发行者”、“印刷者”之项，但“发行者”却与善邻译书馆（右代表者松本正纯）并记为另一社之名。尚未见到的《日本警察新法》情况不详，恐怕亦有同样的记载吧。三本书的“著作者”、著者序文所署日期、译书馆以外的“发行者”及“印刷者”的情况如下。

《国家学》**摇**著作者**摇**吾妻兵治，明治三十有二年六月
发行者**摇**国光社（右代表者**摇**西泽之助），印刷者河本龟之助

《战法学》**摇**著作者**摇**石井忠利，明治癸亥（误）仲秋（9 月 19 日）
发行者**摇**静思馆（右代表者 鸭岛 实），印刷者河本龟之助

《大日本维新史》**摇**著作者**摇**重野安绎，明治三十二年己亥十二月
发行者**摇**国光社（右代表者 西泽之助），印刷者野村宗十郎

三本书中，《国家学》虽在版权页上记“著作者**摇**吾妻兵治”，实际上为平田东助、平定二郎翻译的 Bluntschli 著的日译本《国家

^① 《株式会社 善邻译书馆 为株式会社之理由/计划书/营业设计/营业说明》，全 15 页，德岛县立图书馆藏“冈本韦庵文库”文书，略称“韦庵文库”。韦庵系冈本监辅的别号。上記书名，以下将表记为记录于该图书馆编《冈本韦庵先生藏书及原稿目录》“265 番”之简称：《善邻译书馆开业趣意书》。以下注为“韦庵文库”者，皆上述目录“265 番”内之文书。

论》的汉译^①。另外在《战法学》初页，和“日本陆军炮兵大尉石井忠利著”，并记有“清国善邻译书馆协修王治本订”，前面出现的四明之贡生王黍园，即王治本。

序文里，吾妻虽直记为“善邻译书馆干事”，却和代表者松本同是该馆的实际运营负责人。明记为“参谋本部员陆军炮兵大尉”的石井，据《自序》所言，曾于1895~1896年在驻清国林董公使手下任武官，因赞同该馆宗旨，故将北京时代执笔赠予王公大臣的手稿提供给善邻译书馆。重野头衔只记为“文学博士”，其在馆内的作用或许是“顾问”之类。

在“发行者”项内并记自馆以外的社馆，可认为是为了确保贩卖渠道。而“印刷者”复数出现，或许是为了赶上12月13日的发行（从序文所署日期可知，在时间上是很紧的）。不管怎样，三本书的规格是统一的，封面题字出自著名书法家石埭居士永坂周之手，封面内侧（《战法学》为封面之后的大山题字的后面）的“大日本善邻译书馆藏”的藏版印亦同，其丛书性质的出版意图是不容置疑的。

三

《申报》高度评价善邻译书馆的文化意义，前面已经谈到了，但借助日本来尽快汲取西方近代文明的想法，却并不只是上海的知识人才有的。关于这一点，内藤湖南有宝贵的证言^②。1899年10月4日，湖南在天津面会陈锦涛、蒋国亮时，蒋问：“贵国书籍，翻作中文，此大有益之事，既以可开支那文明，而贵国又得其利，如近日之万国史记、支那通史，中国人买此书者甚多，惜此类书译出者甚少耳。故弟甚愿贵人多译东文书，如贵国维新时之史及学堂之善本，犹为有益。君以为然否？”陈锦涛（1871~1939，广东

^① 原本参看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近代史研究》第100期。

^② 《燕山楚水》，《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筑摩书房，1967，第60、30页。

南海县人），当时为天津北洋大学堂教习，后来留学美国，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总长，是个改革派；蒋国亮（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天津育才馆教习，其思想倾向可明见于问答当中。

对蒋之期冀，内藤答道：“现设有善邻译书馆，吾妻某氏、冈本监辅翁等，方从事翻译。闻贵国李（盛铎）星使亦颇赞此事……《万国史记》，即冈本翁著，《支那通史》为那珂通世氏著，二君仆皆识之。”吾妻某氏，自然就是吾妻兵治了。

距这次天津会谈仅两个多月后刊行的上述书籍，若参照序文，正是十二分地体现了蒋之所期待，内藤湖南之所保证的旨趣。《大日本维新史》的作者重野，讴歌了明治维新以来 30 余年，“锐意励精，刮新振作，乎日进，国威耀于海外”的明治“新政之美”，而且旨在将此表述为孔子之所谓“因所损益，百世可知者矣”，“通于时变”的适宜对策，其言外之意是在炫耀这是些为了有助于中国改革的著作。《战法学》的作者石井，在善邻译书馆编纂新书旨在“输诸清韩，以资其文化”，他希望自己的著作能产生一些作用。而《国家学》的作者吾妻甚至不惮进一步断言：在明治日本的建设中产生了作用的“公而不偏，正而不激”之伯伦知理学说，“于我亚细亚人，可谓有鸿益无小弊者”。

内藤似乎并不清楚吾妻等人准备刊行的书名，但从谈话的应答中可知，他不仅对善邻译书馆的创立意图做了很好的答辩，而且也给予了评价。善邻译书馆的创立意图，在于通过提供汉译书籍这种形式的文化携助，使维新以来的日本文明成就能够有助于清韩两国的革新。

四

内藤湖南的记述称，吾妻兵治和冈本监辅正在合作筹备善邻译书馆的创设。这一说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正像在《申报》的报道当中没有冈本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实际情况是略有复杂的。冈本监辅（1839～1905）为德岛县人，是个因去库页岛探险而勇名远扬的

豪杰之士^①。他结识吾妻兵治，最迟也在因吾妻病休而于 1884 年代为编辑《亚细亚协会报告》时。

《亚细亚协会报告》在《例言》（创刊号以下，每号皆有）中称，日、清、韩三国“同文”而“互通彼此事情”，“行远自迩”，因此本报告以“国文”与“汉文”并用。然而，若不看“论说”栏里的若干国文，国文就只剩下了“和文通报”栏，因此可以说，该报告基本上是汉文杂志。特别是在吾妻担任编辑委员的第 9 号以下，到冈本担任的第 17 号，全杂志无“和文通报”栏而全被汉文所充填。而且在吾妻复任编辑之际，甚至定编辑方针为：汉文“自今必先经在东京清国公使馆馆员添削，然后付割刷”^②。

为使日、清、韩三国互通声气而使用汉文——实行这一编辑方针，是因为有使其成为可能的时代背景。在此两年半以前，担任《兴亚会报告》编辑的广部精作在第 12 号卷首公告，“本报告向用和文录事，而外邦未能尽通，是非所以传本会之意也。因议今后改用汉文，以广便亚洲各国士人之览，非敢有所区别也”，决定以汉文来编辑所有版面。这正像他在独特的论说《官话论》里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种出于自身见地的实践。他认为，当以清国官话为“亚洲之通话”，即东亚的共同语言。^③如上所述，兴亚会是亚细亚协会的前身，广部精作后来作为汉语学者是个驰名的人物。

这是一个为对抗欧美而力图实现亚洲振兴的产物：鉴于因英语作为“通话”的凝聚力，保证了欧洲的兴盛，以清国官话作为“通话”，“以广便亚洲各国士人之览”，亦可实现亚洲的交流、理解和文化的融和。因此，这绝不是有悖时代的汉文癖的表现，而是在西力东

① 金泽治：《冈本韦庵先生家系与年谱》，德岛县教育委员会编《冈本氏自传、穷北日记》（有马卓也先生惠赠）。

② 《本会记事》，《亚细亚协会报告》第 18 号。该号中，只有大仓喜八郎的论说为和文，其余全部为汉文。次年之 1886 年可目睹的 4 号（编辑人恒屋盛服；号数表记更改）则是以汉文为基调的和汉混排。

③ 《本局敬白》及广部精作的《官话论》均在《兴亚会报告》第 12 号。报告到第 11 号为止，除一部分汉文外，基本上是和文会志。

渐面前，着眼未来，积蓄对抗力的东亚近代必要的对策构想。

不过，有意见指出，把面向日本人的读物都变成汉文反倒不便，因此从第14号起开始设“和文杂报”栏，这样，广部气势宏大的尝试即受挫折。杂志后来的版面，和文自然多了起来，但以清国官话为共同语言，意欲振兴东亚的汉文杂志由日本人刊行出来的意义，还是值得关注的。

若进而言之，在这篇小论里已多次出现的重野安绎早就郑重地提倡，不以“训读”（以日语语音语顺读汉文）而以“正则”即当地的正确发音来读汉文，说以“正则”方法来读和说，是理解他国的正道^①。《官话论》的作者广部就是这个重野的弟子。从后来的轻视和无视汉语、朝鲜语，进而是强制推行日语的历史展开来看，这种似乎难以想像的正论，当然只有在这一时期才会吐露出来。

经过这种以兴亚为目的、追求语言凝聚力的文化实践，冈本监辅和吾妻兵治在十几年后，虽几经间隔，终于构想出设立善邻译书馆这样一个机构，以把有意义的书籍通过作为东亚共同语言的汉文译书的方式提供给清、韩两国的改革。

五

在公之于世的有关善邻书馆的文件中，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是以吾妻兵治的名义发表在1900年4月的《亚东时报》上的《善邻译书馆条议引》^②。《亚东时报》是山根立庵虎之助等人在上海刊行的一本杂志，那时，吾妻正在清国活动。

其中这样写道，清、韩、日三国“唇齿辅车”，关系自古良好，只是近年因泰西诸国恃力量之优越，压迫而来，气运为之一变。“我皇上登极之初，广察宇内之情势，取彼之长，补我之短，锐意

^① 《重野安绎演说》，《兴亚公报》第1号。上一年6月，重野曾在东京学士会院发表《汉文宜设正则一科，应选少年秀才留学清国之论说》，在兴亚会的演说，承袭了此文的内容。

^② 吾妻兵治：《善邻译书馆条议引》，《亚东时报》第21号。www.ertongbook.com

革新，力求自强，乃得与泰西各国并驾齐驱以卓立于东海之表者，三十余载于兹矣”。而清韩两国非勤于革新，国势每衰，苟图不灭，当讲求对策。新报、政论、工商等等，“务讲彼我之公益者”，皆为当务之急，而“更有一事尤急焉者”，就是“译述新书，以启迪两国士庶者”。在“博采他邦之实学，以长其才识，旁求近世之新说，以启其知见”当中，“莫如译述我国及泰西有用诸书以传播之也”。这样，我们“纠合同志，创立本馆”，欲使“富强文明之功”致力于清韩两国，故“欲译述新书，以输诸清韩，以表善邻之谊”。

另外，在附于文后的五条“著译凡例”当中，有一条谈到应避免日本的翻译中往往不可避免的“乖错芜杂”，而其他条目里则谈到有必要制作字典^①，以确定学术译语。从这些顾及到的内容来看，正可以说显示了译书馆成员是学有根抵的。

不过，和这篇《条议引》内容几乎相同的文章，一年多以前曾发表在《清议报》上，时间是明治三十一年（1889）十一月，题目为《善邻协会主旨》^②。若暂且不去注意在组织名称上“译书馆”与“协会”的差异，其文章的异同只在若干修辞上，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清议报》上的《善邻协会主旨》无署名，但可以肯定是冈本监辅参与起草的。因为在《韦庵文书》中留下了很多草稿。包括只有一半的残稿在内，草稿有5种都是被订正过的，因此以可数者计，有10种。这些草稿是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来追踪推敲过程的极为宝贵的资料。

倘进而言之，在该文书中还保存着先于善邻协会的“善邻义会”的规约——《善邻义会五规》^③。善邻义会的目的是“以固唇齿相保之势，以尽同舟共济之义，盖欲俾同文诸国人民，均跻开花

① 据《善邻译书馆开业趣意书》说，该馆出版了1300多页的大部头的《英华字典》。未见。

② 《善邻协会主旨》，《清议报》第2号。

③ 《善邻义会五规》，《韦庵文书》。在善邻义会之前，冈本构想了“东洋开国商社”。由此可相当清楚地看到其逐渐演变到善邻译书馆的过程。

之域，以永保天禄于亚细亚洲内”。冈本就该规约草案向重野安绎和三岛毅征求意见，三岛只做了字句上的修正，而重野安绎则称赞该构想“洵为盛举”，有益于“东洋全局之幸福”，“有益乎国家”之“远志”“伟略”。冈本、重野、三岛三巨头之间，过往甚密，而吾妻、松本等人则在其下负责具体事务。

作为善邻义会的广泛追求兴亚目的的一项活动，不久便构想为以刊行汉译书籍为目的的善邻协会。可认为是以冈本为核心推敲而成的《主旨》，虽以无署名的方式刊登在《清议报》上，但在冈本与重野、吾妻之间发生了某种意见分歧，以至后者创立善邻译书馆。吾妻《行略》当中将此说成1898年10月，然而若从上面提到的《主旨》的1898年11月的发表日期来看，译书馆的实际创立应当在稍晚的一些时候。而从实质上和《主旨》具有相同内容的《条议引》是以吾妻的名义公表的情况看，可把善邻译书馆视为善邻协会延长线上的组织。冈本或许引身退出，考虑独自刊行极为畅销的《万国史记》，或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其情况不详。但以笔者之管见，两者之间似并无关系恶化的痕迹。

不管怎样，梦想以兴亚会、亚细亚协会等对抗西方，振兴东亚的亚细亚主义者正掉转到一个特定的方向上来，那就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亚细亚主义，具体化为设置一个翻译机构，以提供近代国家建设和国民形成所需要的书籍。这一动态本身，虽然在世纪末是以善邻译书馆的形态出现的，但上述这些义会、协会、译书馆却都是从平等的立场来追求兴亚的亚细亚主义团体。

六

吾妻兵治和松本正纯于1900年初访沪，是为了确立善邻译书馆刊行书的贩卖方针。吾妻等人当时全神贯注的是市场调查和对付盗版^①。

^① 《善邻译书馆开业趣意书》，第1~2页。当内藤湖南同样提到版权问题时，蒋国亮表示的解决办法亦同样是由官方发布禁令（《燕山楚水》，第60页）。

前者为了调查有着“尊内卑外”癖的中国人是否会购买日本所翻译刊行的书籍，关于这一点，吾妻等人在听取了文廷式介绍后确信销路将不会有问题。而另一点，即对付盗版问题，由于有官方作为特例颁布的《翻刻禁止令》因而简单地获得了解决。而且，“所到之处，总督巡抚道台等大赞吾馆之美举，率先购买译书，谋求普及各地之途径”，因此，他们在上海的访问任务是成功的。这一成功，恐怕致使松本单独先行回国，构想改组善邻译书馆，使其发展成一个“株式会社”（股份有限公司）。

顺便还要提到，作为知识产权的版权（著作权）问题，当时在日本有《东洋经济新报》等提倡确立，梁启超的《清议报》上也有对此响应的建议^①。新报主张：“我日本与支那同洲同文之国，关系最亲密，今我日本得文明之智识，先于支那一着，今日以日本所得之文明，分布于支那，而为供给之，亦同洲同文之国所当尽之职分也。”这一主旨，与善邻译书馆基调相同。而就此做出回应的无署名“来稿”认为，日本作为“举国扶我助我为心者也”，提供译书乃“扶植支那唯一之政策”，因此，日本知识人若在一二年内将“日本之要籍，悉输入于支那，则非惟我国之福，亦东方全局之福矣”。

介绍新报之倡导和来稿同登一号，可使人窥知来稿者是个极为接近梁启超的人物，若进而言之，恐怕是领会梁启超的意思而写作的。而且，来稿在强调有必要实施版权制度的同时，还提议采取在京师和通商口岸“严行之”，在内地则“稍宽之”的双重办法。这一意见与梁启超在吾妻译《国家学》刊行之前，只做若干修辞上的调整，不署译者名而将其连载^②于《清议报》有关。连载长达半年，吾妻当然不会不知道，只是默认了下来（当然也不排除真不知道的可能性）。在开始实质性活动之前，善邻译书馆方面提出了意

① 《论布版权制度于支那》（引自《东洋经济新报》），《清议报》第13号，外论汇译；《读经济新报布版权制度于支那论》，《清议报》第13号，来稿杂文。

② 《清议报》第11~13号（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

见，因此到第31号便突然中断了。

由于访沪任务圆满完成，有了展望未来的光明前景，有关参与者决定把善邻译书馆扩充组建为“株式会社”。于是也便有了《善邻译书馆开业趣意书》。其初步计划是这样的：资本总额20万日元，第一批投入金额5万日元，其中3.5万日元用于出版35种新书，根据文廷式的介绍，以读书人口40万以上计，毛算出初版将销售一万部，并根据该预测推算出股东将获得13.5%强的红利^①。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一厢情愿地夸大了的预测。但在这个要办株式会社的计划当中，却可以明显地看到吾妻等人的实业观。吾妻早就主张日清两国商人应该合纵收复商权，对抗西商，其认识基点是“各商专营私利，而两国之公利不可胜数也”。换言之，是要变营利性质的“私利之追求”为国家性质的“公利之实现”^②。而亚洲的兴起，则被想定在日清两国公利之实现的前方是自不待言的。借助建立在如此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出版事业，以相互间的合作，使日清两国跨越文明的阶段，赶上西方的举措，在上个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是被认真地摸索和实践了的。

然而，善邻译书馆的这一有意义的尝试却没能获得成功。日、清、韩三国强化善邻关系，通过文化接受而采取同一步调，振兴亚洲的幸福关系终为梦想，看似充满光明的计划亦归于画饼。

吾妻兵治《行略》谈到了计划受挫的理由：一是带到中国的数万部书，在义和团影响下的混乱中，“率其为所掠夺烧弃”；二是幸免于难的吾妻到达福州后发病，回国后亦不治，转为慢性病，从此再不能从事活动。生病对吾妻个人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打击，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携带的数万部书籍遭毁，其损失也是相当严重的。前面提到的《国家学》等书，因无定价记载，所以受损失的情况难以准确计算，但《善邻译书馆开业趣意书》的“营业说明”

^① 《善邻译书馆开业趣意书》，第10~14页。

^② 《论日清宜收握商权》，《亚细亚协会报告》第8号。

里提到，平均原价 20 钱，定价 50 钱，初版印刷 5000 部^①。若照此而言，以 4 种书籍，计 2 万部，平均定价换算，其损失当为 1 万日元。虽然不能准确把握页数与原价的关系，但按照原价计算，其损失就是 4000 日元，所以，似乎也谈不上因此而不能东山再起。列举这些数字，是由于笔者认为《行略》所言，并非真正的原因。

缺少核心人物，凝聚力自然就要削弱，其结果是导致活动的停滞、消灭。这是常有的事。善邻译书馆因吾妻兵治的离队而步入此路，也并非不可思议。然而，有那么多重要人物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的善邻译书馆，竟受吾妻一人去就的左右，也是很难想像的。例如，即使是前面提到的版权问题，实际上也没能获得任何解决，这个尾巴后来一直拖到梁启超和天野为之的断交事件。^② 而至于包含着大量的如此个别问题在内，不是建立在日中对等、步调协同关系基础上的亚细亚主义，而是归结为日本占主导地位、充当亚洲盟主形态的亚细亚主义的逐渐得势，我准备另找机会进行探讨。

① 《善邻译书馆开业趣意书》，第 13 页。外相机密费 2000 日元，当抵目睹三本书（约 3000 页）（三铃书房，1999）制作原价的 1/3。

② 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思想》，《共同研究 梁启超——西方近代思想的接受与明治日本》，第 251 页。伯伦知理著《国家论》的“卷之一”部分，先是刊登在《清议报》上，后来又以《国家学纲领》为题，明记为“译者饮冰室主人”，于 1902 年 5 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这一情况，对了解梁启超实际上怎样处理版权问题，倒是饶有兴味的。

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

桑摇兵

近代日本对华关系，除了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还有各种利益团体与中国民间人士、社团以及地方政府、社会的关系。后者不仅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补充，还使之广泛深入中国地方的内部事务，立体式地对中国的政局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日方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地区的重视程度不一，发生影响的大小各异。1900年前后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活动，即为典型个案。关于东亚同文会的历史，已有专书，相关研究涉及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惟其中广东支部存在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对该支部的组织及其活动多语焉不详。事实上，这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内外矛盾全面激化，朝野上下，各种政派集团纷起行动，企图按照各自的政见利益改变社会发展方向，因而政坛上波谲云诡。乘机插手中国内政的外部势力，得以纵横捭阖，发挥作用。描述分析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组织、活动与趋向，补正史实之外，更能进而透视近代中外关系的大框架下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作用。

—

东亚同文会成立于1898年11月2日，系由东亚会和同文会两个以研究日中时事问题为标榜的团体联合组成，为当时日本最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版，请访问：www.e1tongbook.com